

● 中国历史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考古学意义^{*}

倪 婉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倪 婉(1963-), 女, 浙江永康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考古系讲师, 主要从事文物考古研究。

[摘要] 出土文献在考古学综合研究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云梦睡虎地秦简的简文内容, 反映出诸多考古学信息, 如墓主人年龄、身份、秦代楚地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的变迁、风俗等, 这些记载为研究秦代江汉地区埋葬习俗、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提供非常珍贵的文字资料。

[关键词] 睡虎地; 秦简; 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 K 8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4-0696-04

云梦睡虎地 M11 棺内发现的 1155 枚竹简和 M4 头箱中部出土的两件木牍, 是我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秦代简牍。这批秦简自 1975 年出土以来, 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简文内容极其丰富, 极大地填补了史料记载空白。简文所反映的大量考古学信息, 为我们的考古学研究, 特别是为战国秦汉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一) 秦简所提供的考古学年代依据

在 M11 墓主的头下, 发现了 53 枚竹简, 简文的内容为《编年纪》。“《编年纪》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公元前 306 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等大事, 同时记有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 有些像后世的年谱。”^[1](第 1 页)简文还对“喜”的身份和经历做了较详细的记述。

《编年纪》明确地记载: “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 262 年), 在秦王政元年(时年十七岁)即登记名籍为秦国服徭役, 尔后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等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吏。这些记载实际已经为我们暗示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入葬年代。从随葬的 1155 枚竹简内容看, 《秦律十八种》(共 201 枚简)、《效律》(共 61 枚简)、《秦律杂抄》(共 42 枚简)、《法律答问》(共 210 枚简)、《封诊式》(共 98 枚简)等与法律有关的竹简占了 M11 出土竹简总数的近半数。这批竹简应与墓主人生前所从事的官职有关。而《编年纪》中又特别记载了“喜”的生平、“喜”所担任的安陆御史、安陆令史等官职, 这些说明他正是这批竹简文书的所有者。另外, 《编年纪》所记载“喜”的生年为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 262 年), 《编年纪》的最后一年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 其间共 46 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中关于 M11 人骨架的鉴定结果为 45 岁的男性, 这与《编年纪》中的“喜”的年龄基本吻合。因此, 可以确定“喜”就是 M11 的墓主人, 且下葬时间应为公元前 217 年。

《编年纪》所提供的不仅仅是 M11 的墓主人和下葬时间, 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对江汉地区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分期提供了年代依据。结合 M7 棺室门楣上刻的“五十一年曲阳徒邦”字样(“五十一年”为秦昭王五十一年, 即公元前 256 年)^[2](第 68 页), 睡虎地这 12 座秦墓在考古学分期上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二) 简文反映的环境考古信息

《秦律十八种》之《田律》有这样一条律文：“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鬚(卯)殼，毋□□□□□□毒鱼鳌，置穿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棺)享(椁)者，是不用时。”^[1](第26页)这段简文规定在每年的2月至7月，除死人需用的棺木外，不许砍伐山林；在鱼鳌与野兽的繁殖期间，严禁捕捉。森林资源与动植物的保护，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秦律的这条律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由于滥砍乱伐所带来的生态危机。

人类的进化和发展与山林息息相关。最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食物为生，茂密的山林既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火的主要材料。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由于固定居所的需要，林木又被大量地用作建筑材料。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4100年)，随着以种植农作物为代表的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人口迅速增长，木材被广泛地运用于建筑房屋、埋葬死者的葬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各个方面。这可以从大量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时期对原始生态环境的破坏尚处于初始阶段，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破坏。

在我国，第一次对森林资源造成灾难性破坏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这一时期随着私有制的萌芽、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矛盾也逐渐加剧。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大量砍伐森林、兴修土木。特别是商代，奴隶主贵族除利用大量木材修建豪华宫殿外，还对丧葬礼制作了严格的规定，成批的上好木材被用于修建墓室和葬具。这样大规模的伐木持续了1000多年，第一次对森林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整个西周和东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滥砍乱伐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对森林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比商代更严重，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周礼在丧葬制度方面认为生亦死，死亦生，人死后照样要享受阴间的生活，这样就使得厚葬之风盛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厚葬”的程度。在江汉地区已发掘的战国楚墓中，一座小型墓(下层贵族墓)的葬具一般用木材5—10立方米，中型墓(中下层贵族墓)为10—30立方米，大型墓(中上层贵族墓)为50—100立方米，而特大型墓(楚王、封君一级)的木材用量要超过500立方米。据《曾侯乙墓》发掘报告所记，仅墓室内填积的木炭就达6万公斤，椁室用木材378.633立方米(折合原木超过500立方米)，这还不包括主棺和21具陪葬棺所用的木材^[3](第10—12页)。建筑宫殿所耗木材量更是大的惊人。潜江龙湾章华台遗址所揭示的楚国宫殿基址，一个柱洞的直径在1.45米见方^[4](第21页)，仅一根柱子所用的木材至少在10立方米。如此推算下去，一座章华台所使用的木材便数以万计。

战国一世，由于连年的更迭频繁，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战争带来的伤亡人数是无法统计的。在楚故都纪南城周围，绝大多数战国墓内出土有青铜佩剑，战争已将每一个男子武装起来。墓葬与墓葬之间的距离非常之小，有的同期墓葬的间距只有几厘米，说明了死亡人数的巨大，死亡周期缩短。因阵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在一定时间内大大提高，这使得制作葬具所需求的木材量也在一定的时间内大大增加，而资源是有限的。在楚墓的随葬品种类中，漆木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见木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漆木器作为一种奢侈品，所用的木材不仅数量大，而且浪费也大。到了战国末年，各地因无限制地破坏森林，使得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生态失衡。

秦王朝的统治者首先认识到了森林乱砍滥伐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并用法律的手段加强林木管理。《田律》的律文不仅严明，而且非常科学。2月至7月是林木的保育期和生长期，律文规定在每年的这一时期不许砍伐山林，是有科学依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秦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倡导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政府。但是，由于它所受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完全认识森林毁坏的根本原因(如对棺木用材就没有限制)，厚葬之风继续蔓延，森林资源岌岌可危。到了西汉时期，对森林的破坏出现第二次高峰，这时候人们已经无法就地取材，森林资源严重匮乏。一切有关的习俗和礼制开始真正体味自然的惩罚。

(三) 简文对江汉地区秦墓分布的提示

关于江汉地区的秦墓分布情况，学者们已有不少研究。《简文》要依次传递南郡

各县、道，另抄送江陵。其中的“别书江陵布”一句^[1](第 16 页)，应该另有内涵。

江陵本是楚国的核心区域，也是战国末年楚国的都城所在地，是楚文化的根据地。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 279 年），命大将白起率军攻楚，“拔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作为楚国大本营的江陵，是秦最重要也是毁灭性打击的地区。秦的毁灭性打击带给当地楚人一方面是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另一方面是仇恨和反抗。因此，北方来的秦本土移民和官吏都不愿也不敢在江陵一带居住和做官，这里实际上成了一个“另类地区”。像《语书》之类的法令文书都是以“别书”的形式送到江陵公布执行。

在江陵地区已发掘的墓葬材料中，典型的秦人墓屈指可数，且为零星分布。到目前为止，已见所发表的秦墓仅有江陵凤凰山^[5]（第 302 页）、江陵王家台^[6]（第 37 页）、江陵扬家山^[7]（第 1 页）、荆州高台^[8]（第 4 页）、关沮周家台^[9]（第 26 页）等，而且数量极少。这种现象与襄宜平原、云梦一带的秦墓资料形成鲜明对比。在云梦，仅睡虎地一处一次就发现秦墓 12 座^[2]（第 1 页）。目前云梦、襄宜平原已发现秦墓上百座。因此，典型的秦人墓葬可能主要分布在江陵东北地区，今天的随枣走廊至云梦一线的分布较为集中。

（四）秦简所反映的江汉地区秦统一期间的埋葬习俗

关于秦统一期间江汉地区的埋葬习俗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秦统一的时间虽然很短，从秦王政发动大规模的灭六国战争（公元前 246 年）到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 年）只用了 25 年的时间，但接下来也仅仅维持了 15 年就被汉高祖刘邦所取代（公元前 206 年杀秦王子婴）。前后 40 年，而且大多数时间处在战争期间，但这并不影响秦代的强权政治。然而，这种强权政治是否真正改变了其征服地区的风俗习惯呢？我们来看看江汉地区。

江汉地区是楚国的腹地，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仅在江陵都郢就达 400 多年，并形成了与周天王抗衡的强大势力。几百年来，楚国一直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国土和势力范围，使得楚风楚俗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和鄂渝边境的广大地区成为主导习俗。以楚式鼎为特征的随葬品组合在这些地区的战国墓葬中都能见到踪迹。在江汉地区，楚墓的分布更是遍布每一个角落，仅江陵一地，迄今为止经过考古发掘的战国中晚期楚墓就达 3 000 座以上。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罕见秦墓呢？从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到秦亡国，秦在这里的统治也有半个多世纪，在秦统治期间的埋葬习俗如何呢？是用秦俗？还是用楚俗？还是二者融合？

睡虎地秦简的《编年纪》给了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启示。《编年纪》对“喜”的生平所做的详细记载无疑证明“喜”是一个地道的秦官，他死后是用秦的埋葬习俗下葬的。M11 的随葬品组合为小口陶瓮、罐、釜、盂、甑和茧形壶，以及铜鍪、蒜头壶等器物，这都是典型的秦器，与战国晚期同类楚墓（中小型墓）中随葬陶鼎、簠、壶等组合的特点大相径庭。在楚墓中像 M11 这类墓只要随葬陶器，一定有鼎和壶这两种常见器物，而 M11 没有使用，说明 M11 的墓主人“喜”不仅是一个秦官，而且是秦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必须将秦代墓与秦人墓严格区分开来。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睡虎地秦墓看成是秦代墓，而且应当将之与秦统一后的本土墓葬进行对比，从中寻找本土墓与秦人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方面的差异。这实际上又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江汉地区战国晚期的楚墓应该再进一步细分，将秦统治期间的楚人墓与楚亡国前的楚墓区分开来。这一地区秦墓出土少的原因不在秦墓本身数量少，而是我们没有认识楚墓在秦代的特征。如果笼统地以随葬蒜头壶等典型秦器作为判断秦代墓的标尺，那就很容易将这一时期的楚人墓归到战国晚期，也就无法看清秦代墓在江汉地区分布的本来面目。

秦灭楚后当地楚人顽固地坚持旧俗、反抗秦统治的情况严重存在。这可以从睡虎地秦简中得到例证。简 058 载，南郡地区“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1]（第 15 页）；简 055 指出，国家制法是为了“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除其恶俗”^[1]（第 15 页）。这两条简文十分明确地指出“乡俗之心不变”的民情，而埋葬习俗应是主要的乡俗。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在秦统治时期内，江汉地区有两种共存的埋葬习俗：楚俗和秦俗。土著楚人（或称楚遗民）继续沿用战国晚期楚地的埋葬习俗，但在规模等级

上大大降低(江陵地区经常出土一些有棺有椁而随葬品很少的一类楚墓,这可能就是秦代墓)。云梦睡虎地的秦墓应称为秦人墓更为准确。

考古学是一门以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目的是通过解释发掘对象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到秦代随着秦始皇统一文字,大量的文书档案资料开始与中国历史并行。简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考古发掘对象的简牍资料,含有大量的信息。现有研究表明,掌握这些信息资料,对于考古研究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考古学借助简牍信息来诠释某一时期的历史现象将会更加准确和完备。睡虎地秦简为我们提供的考古学信息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对我们认识楚秦汉更迭时期江汉地区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再读《云梦睡虎地秦简》,回首已经发掘的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深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更多的学术问题值得探讨。秦设南郡对江汉地区的统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时期,新的文化因素(秦文化)与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楚文化)在这里发生强烈的碰撞,如何认识和理解这种碰撞所带来的裂度和融合,是考古学所面临的新问题。新出土的文献史料在补充已有的文献记载的同时,又在不断诠释与之伴出的各种考古实物以及这些实物的历史面貌。睡虎地秦简的考古学意义当是如此。

[参 考 文 献]

- [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Z].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 [2]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 云梦睡虎地秦墓[Z].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3] 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墓[Z].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4] 荆州地区博物馆,潜江县博物馆. 湖北潜江龙湾发现楚国大型宫殿基址[J]. 江汉考古,1987,(3).
- [5]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A]. 文物编辑委员会.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 [6] 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王家台 15 号墓[J]. 文物,1995,(1).
- [7]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扬家山 135 号秦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3,(8).
- [8]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荆州高台秦汉墓[Z].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9]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 关沮秦汉墓清理简报[J]. 文物,1999,(6).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Qin Bamboo Slips at Shuihudi in Yunmeng County: Archaeological Meanings

NI W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NI Wan(1963-), female,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bstract: The unearthed docu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Archaeology. The contents of *Qin bamboo slips* at *Shuihudi* in *Yunmeng* county reflect much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ages and status of tombsoccupant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Chu area in Qin dynasty, the chang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customs, etc. These contents provide a very valuable written materials for studying burial custom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Qin dynasty in Jianghan region.

Key words: *Shuihudi; Qin bamboo slips; archaeology*